

上博简《孔子诗论》“小雅”论及其诗学史创获

徐正英

内容提要 上博简《孔子诗论》“小雅”论第三简当补足为“[《小雅》少德]也，多言难而怨怵者也，衰矣少矣”，第四简当补足为“[孔子]曰：诗其犹垆门”“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将简文与74首“小雅”文本、简文解20首“小雅”作品之言、历代解74首“小雅”成说作“三重对读”，确认孔子对“小雅”内容所作抒写苦难、宣泄怨情、反映民众忧患、揭示上下交恶四个方面的归纳评述，与“小雅”文本主体指向深度吻合。孔子以“情”论诗和以“怨怵”定性“小雅”风格特征，将西晋的“缘情说”与西周末年的抒情意识实现了勾连，也使“怨诽说”成为汉代以来人们对“小雅”风格特征的基本共识。

关键词 简文补正；三重对读；以情论诗；勾连“缘情说”；沾溉“怨诽说”

上博简《孔子诗论》在逐篇解读《诗经》作品、分类归纳“四诗”诗旨与风格特征、揭示三大文艺类别本质属性的三个层面中，第二个层面“颂”论、“大雅”论、“小雅”论、“邦风”论最为复杂且内在关联性最强，孔子是将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比论述的。因此，本文是笔者已刊“颂”论、“大雅”论两篇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有机组成部分^[1]。

一 孔子“小雅”论简文补阙、隶定与释读

因“四诗”论是一个有机整体，为便于“小雅”论研究，先完整过录经笔者考订隶定补充过的《孔子诗论》论“颂”“大雅”“小雅”“邦风”文本如下：

【第二简】……《颂》平德也，多言後（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麤（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周]，□□□□□□【第三简】□□□。[《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怵者也，衰矣少矣。《邦风》其纳物也溥（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唯能夫□□□□□□【第四简】□□□□[孔子]

曰：诗其犹垆门■。与贱民而讎（怨）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罢（戚）倦（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有【第五简】怨王者何如？曰：《大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2]

先说“[《小雅》□德]也”残句。经考证，第二简末尾和第三简开头残简所阙15—16个字的末尾，能补出的就是这3个字，学界无异议。“小雅”两字前面的阙字肯定是“大雅”论的内容，与“小雅”论无关，也是学界共识，可忽略。而“[《小雅》□德]也”最关键阙字“□”应该是什么字呢？前文“《颂》平德也，多言后”“《大雅》盛德也，多言[周]”之论，是孔子依次认为，早出的宫廷“周颂”内容实质是歌颂周祖暨文王武王平定天下之德，较早的上层贵族“大雅”内容实质是歌颂周族革故鼎新创业之德。依次类推，孔子对集中于西周晚期的“小雅”内容实质所言之德，不外乎从大小、多少、盛衰、好坏着眼归纳。而由下句“多言难而怨怵者也”的评述可知，孔子认为“小雅”内容多写苦难和怨愤，因而作品对统治者之德的抒写必然是负面的。在负面的“小”“少”“衰”“坏”诸字中，下句简文的“衰矣

少矣”之评则为我们选用“□德”之“□”缩小了范围，限定只能从“衰”和“少”中二选其一。此“衰矣少矣”4字是对上句内容实质的深层揭示，多写苦难和怨愤，正说明了政治的衰败与当政者的少德。尽管学界对“衰”和“少”有多种解释，但笔者认为原整理者和陈桐生的解读最为符合文本原意^[3]。就单字而言，若将“衰”解作“衰”，则与“少”或“小”意思不连，搭配不成句；若“少”读为“小”，则否定语变成了肯定语，是对小德的正面肯定。就整句而言，“衰矣少矣”既不可能重复指称当政者德衰又德少，更不可能重复指称当政者德衰又德小，又不可能重复指称政衰又政少或政小；同时也不可能各自分指德衰政少或德衰政小，因为政少、政小不成辞。所以，“衰”只能单指政治衰败或社会衰败，“少”则只能单指当政者少德或德少。如此，“[《小雅》□德]也”之“□”就只能用“少”字填补。此外，还有一个最有力的实证，即上博简备用的一枚残简上正好有“《小雅》亦德之少者也”^[4]一句，明言“小雅”少德。由此确认，简文文本原为“《小雅》少德也”无疑。孔子认为，“小雅”的内容实质是批评少德。

再说“[孔子]曰：诗其犹墉门”句。第四简阙字最后补“孔子”二字确切无疑，但原整理者将“诗其犹墉门”隶定为“诗其犹坪（平）门”就未必对了。该句确实难解，故词义被释得五花八门，仅《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所录认为“正确或可备一说者”依时间次序就有平门（城门）、墉门（多闻）、平门（便门）、坊门（里巷之门）、旁门（四通之门）、墉门（广门）、坊门（堤防）、坪门（扩大言路门径）、墉门（防门）、墉门（衡门）、旁门（义理宽达）、重门、平门（平和之门）、平门（正对其门）、坊门（棚门）、平门（贵贱平等之门）、圣门（声门，通往心灵的一道门）、声门（声闻）、平门（平齐行列之门）、旁门（广门）、平门（平正之门，公平的大门）、平门（辨别思想的门径）8种隶定22种释读^[5]，令人眼花缭乱。笔者原信从黄怀信“平齐行列”之说，认为这里孔子是将“颂”“大雅”“小雅”“邦风”四诗平齐分类、逐一论之。今深究发现，可能错了，因为平齐分类是对“平门”之解，而“平门”之读源于对“坪门”的

隶定，但“坪”字隶定当不合原字字形。“坪”第四简简文写作“𡵓”，第二简“《颂》坪（平）德也”之“坪”写作“𡵓”，两处笔画稍异但应为同一个字。原整理者将“𡵓”“𡵓”隶定为“坪”并未说明理由，仅申述“坪德”读为“平德”的理由是“金文《平安君鼎》之‘平’作从土从平，坪、平古通用”^[6]。很明显，简文原字形是从“土”从“𡵓”，不可能从“土”从“平”，“平”的笔画太简单了。原字“土𡵓”读为“墉”，“墉门”即广大的城门，全句为“[孔子]曰：诗其犹墉门”，这才是正解。其实，整理者的成果尚未正式刊布时，“坪”字的隶定就遭到过曹峰的“存疑”^[7]。尽管后来季旭升以《子羔》《容成氏》“𡵓”“𡵓”二字形只有隶定为“坪”文意才通为由为其回护^[8]，但古字隶定毕竟首先要尊重古字形体本身，其次才是疏通文意。如此，则“《颂》坪（平）德也”为学界普遍认同的“周颂”乃歌颂周朝平定天下功德的解释是否就不合适了呢？倒也不是，按新的隶定，解为“歌颂周朝伟大的功德”本身就包括平定天下之功。至此，笔者以为，“[孔子]曰：诗其犹墉门”整句的真正意涵是孔子认为《诗经》“颂”“大雅”“小雅”“邦风”四大门类作品就像广大的城门出入行人一样，都是用来宣泄作者情感、读者用来进入作者情感世界的宽敞通道。

最后说“民之有罢（戚）慍（患）也，上下之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几句。第一句“民之有戚患也”字面很好理解，是说诗中所写民众的有忧患内容。即便按习惯用法将“罢”通假读为“疲”，全句解为诗中写的民众的有疲惫忧患内容，大意仍不变。第二句“上下之和者”与第一句意蕴密切，字面也不难理解，是说诗中写的上下级的不和内容。不易解读的是第三句“其用心也将何如”，众解纷纭。廖群解为“是以《邦风》中的‘用心’何如，证明歌诗是抒情的”^[9]，冯时认为“‘民之有戚患’且‘上下之和’乃解《小雅》之用心”^[10]，都有道理，只是具体含义不明。笔者以为，这是孔子讲自己“雅颂各得其所”的“删诗”活动。前两句属于未说完的半截句，连上第三句才是完整的一句话，大意是说作者“用心”抒写的“民众的有忧患”和“上下级的不和”两类诗歌内容，将如何归类处理呢？最后

“[曰《小雅》是也]”句增补无异议,意思是说将两类内容都归到“小雅”中来。

若如上辨析大体不错,将补足隶定后的“小雅”论简文抽绎出来当为:

【第三简】……[《小雅》少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矣少矣。……【第四简】……[孔子]曰:诗其犹墉门。……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

简文大意为:《小雅》批评少德,主要抒写苦难内容和怨愤情绪,以此揭示政治衰败和当政者少德。孔子说:诗歌就像敞开的城门供人出入一样(而供作者宣泄情感、读者进入作者情感世界)。民众的有忧患,上下级的不和,这类内容作者用心抒写了,将如何归类处理呢?说:归到《小雅》中来。

二 孔子对“小雅”门类内容的归纳评述

由简文可知,孔子对“小雅”内容的归纳评述大致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对“小雅”定性,认为其内容实质是批评“少德”;第二个层面认为在批评“少德”的“小雅”作品中,多数是抒写苦难内容和怨愤情绪,也正是这部分作品才凸显出政治腐败和当政者少德;第三个层面认为另有抒写民众忧患和上下级不和两类作品,也应归属到“小雅”中来。孔子对“小雅”内容的具体评述又可分为四类:一是“多言难”;二是多言“怨怼者也”;三是言“民之有戚患也”;四是言“上下之不和者”。若要确认孔子如上概括是否真正反映了“小雅”内容的本质特征,还需回归文本本身。

众所周知,“大雅”大部分作品作于西周前期,“小雅”则以西周末期厉、宣、幽三代作品最多,尽管经历宣王中兴时段,但毕竟是短暂的回光返照期,其诗歌作品多抒写“难”和“怨怼”自在情理之中。今本“小雅”共74首,据黄怀信《解义》统计,其中字面明言“难”“怨”者就占去41首^[11],说明孔子对“小雅”主要内容性质的确认是符合文本实际的。黄氏的统计与言论摘录很有启发意义。不过,笔者以为,若要彻底解决这一问

题,仅从字面对读“小雅”文本仍显不够,还需另三个对读:一是逐篇对读74首“小雅”文本;二是逐篇对读简文对20首“小雅”作品的具体解读;三是逐篇对读自“四家诗”开始的历代经典成说。在“三重对读”基础上,再从中选取字面明显之例,得出的结论就会更为客观。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孔子将“小雅”内容性质大致归纳区分为四大方面,但具体到某首作品,其内容抒写和情感表达,往往是混融一体而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下面所举四类篇目也只是相对而言,且少量篇目难免会跨类重复出现。

先看“多言难”方面。小雅”作品字面上至少言及到“三难”。

一是言内忧之难。这部分作品主要揭露政治衰败,朝政无道。例如,周幽王时大夫家父在《节南山》中抒写的西周末年或灭亡后的国家之难,颇有警示意义:“国既卒斩,何用不监”“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昊天不傭,降此鞠訕”“式月斯生,俾民不宁”“昊天不平,我王不宁”^[12]。这些诗句虽将国家的灾难、凶险、丧乱、不宁都归结为上天的不眷顾,但这只是个借口和抒写方式,实际上正如简文所论:“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13]落脚点是斥责君王德衰,乃最深切的内忧。《正月》是一位失意官吏忧国忧民的诗。按清人方玉润之解是典型的“言难而怨”之作:“此必天下大乱,镐京亦亡在旦夕,其君若臣尚纵饮宣淫,不知忧惧,所谓燕雀处堂自以为乐,一朝突决栋焚,而怡然不知祸之将及也。”^[14]今人高亨也认为这是一首集国难、忧伤、悲悼、怨恨多种内容和情绪于一体的诗^[15]。全诗多章抒写政治衰败、生态恶劣、朝政暴虐、民众苦难的亡国景象,由“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踏”“今兹之正,胡然厉矣”“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16]等句的字面亦可见出国难之重。《十月之交》古今解读一致,都认为是周幽王大臣所作揭露朝政无道的诗,其特征是写因君臣无道而致天怒人怨,灾异频发。代表性句子“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17]等,以恐怖之言写日食、月食、地震等国难征兆,难怪简文称赞其“善諗言(善用讽刺之语)”^[18]。《雨

无正》古今解读相同,认为是揭露幽王与群臣误国的诗。直接抒写国难之句颇多:“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写饥荒与滥伐四方;“旻天疾威,弗虑弗图”“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写昊天暴虐,灭绝宗亲;“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凡百君子,莫肯用讯”^[19]写群臣无一为国负责。因此简文评其为“言上之衰”,可谓中的之论。《小宛》古今说法众多,迄无定论,但正如简文所评,“其言不恶,少有危焉”^[20],也是一首揭露批判黑暗现实的诗,但因批判性意见表述得比较委婉含蓄,所以作者不会出什么危险。其“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21]等,皆以感伤的形式表达对国事的忧患之情。

二是言外患之难。主要抒写少数民族侵扰所带来的忧患。北患如,《采薇》古今解读一致,写玁狁之患致将士久戍难归之诗。其“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22]等句,明言玁狁致国难,亦致自己有家难归。《出车》虽古今解读不一,但都承认是战玁狁之诗。笔者以为,诗中明明有“玁狁于襄”之句,更几次重复出现“赫赫南仲”^[23]句,故《鲁诗》说该诗为“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24]是可信的。诗中“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忧心悄悄,仆夫况瘁”^[25]等句,国事多艰之实与个人忧患之情并抒。《六月》古今解读一致,写宣王北伐。由“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26],可见玁狁大兵压境至泾阳,外患致国危的表述昭然若揭。南患如,《采芣》古今解读同,写宣王南征。其“蠢尔蛮荆,大邦为仇”等句,虽蔑视蛮荆愚蠢,竟敢与大国为仇,但毕竟言明给国家带来了忧患。

三是写时世艰难。如《常棣》古今说法一致,宴请兄弟诗,讲兄弟友爱。但其“死丧之威,兄弟孔怀”“脊令在原,兄弟急难”^[27],却写出了时世艰难。《车攻》古今认识一致,周天子大会诸侯狩猎之诗。但目的在于示威,威慑图谋不轨者。其“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之子于征,有闻无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28]等句,宣天子之威犹宣国威,写狩猎而犹出征,叙狩猎回朝而犹远征凯旋,大功告成。实客观反映了治国的不易,须时时提防诸侯的反叛,确如黄怀信称

“是有难”也^[29]。

次看“(多言)怨怼者也”方面。笔者认为,其与“多言难”方面是因果关系,密不可分,诗歌抒写苦难内容,其宣泄的必然是不满情绪,二者混出于同一首作品是自然的。仅从字面看,“小雅”作品至少有“六怨怼”。

一是忧世伤乱之怨怼。这类作品体量最大,作者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如,前已列举的《正月》,在揭露朝政无道的同时,其“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忧心惻惻”“哀我人斯”“心之忧矣,如或结之”^[30]等句,更是表达了诗人感时伤乱、为国事忧心如焚的痛彻心情。前已列举的《十月之交》,在写国难、天灾人祸、哀叹百姓不幸的同时,用大量诗句抒发了自己的遭遇和怨恨:“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31]等句,抱怨自己受迫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32]等句,委屈自己遭谗毁;“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羡,我独居忧”^[33]等句,直抒社会对己不公的胸中怨愤。《小旻》古今多认为是周大夫抨击幽王君臣谋划失误的误国诗。该诗通篇表达了诗人对高层决策失误的忧虑与批判,而其“谋臧不从,不臧覆用”“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34]等句,则对当政者好的意见不采纳、小人意见皆听从的做法表达了深深的怨恨之情。所以简文评这首诗时已告知我们“《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35],也就是说其表达了作者对统治者决策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高度忧虑与怀疑,乃一语中的。《鼓钟》解读纷纭,刺幽王说、昭王时诗说、淮水君子说,不一而足,但皆承认作者抒发了伤时感怀之情。其“忧心且伤”“忧心且悲”“忧心且妯”^[36]可见,其中“伤”“悲”“妯”解为自伤亦无不可,但三个重复的“忧”,抒发的必是忧世伤时之情。《頍弁》众解歧见迭出,但内容写宴会当无问题,由各章重复出现的“未见君子”“既见君子”^[37]句,又知是贵族的宴会。程俊英称“末章反映了西周末年统治集团对国家前途悲观失望和及时行乐的心情”^[38],可谓确解。从“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39]等句,不难感受出其人生无望的伤世之叹。《角弓》篇《毛诗小序》称“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40],后多

从之。深研文本，诗人对朝中的衰败风气表达了深深忧虑是没问题的。“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41]，伤朝中见利忘义之风；“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42]，忧用人不量力而行；“如蜚如髦，我是用忧”^[43]，直接表达对无知小人得势的不满情绪。

另外，还有些基层小官吏的作品，虽限于地位和眼界，未必能表达出对国家和时世层面的思考与忧虑，但结合自己经历，也同样表达了怨怼情绪。如，《四牡》古今体认相同，是一位出使小官吏的怀归诗。全诗每章都表达了不能回家安居侍亲的伤痛。“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谗”^[44]，其怀归侍母的悲伤情绪，明显是对官场的厌倦与不满。《四月》今人多认为是一首小官吏诉说行役之苦的诗。更有不少忧愤不平之句：“先祖匪人，胡宁忍予”“民莫不穀，我独何害”“我日构祸，曷云能穀”，抱怨上天对己不公，处处不如人；“尽瘁以仕，宁莫我有”质问自己尽心仕职，为何得不到承认；“匪鹑匪鸞，翰飞戾天。匪鱣匪鮪，潜逃于渊”^[45]，甚至幻想要逃离这个不平的世界，其怨愤情绪可想而知。

二是劳役无期之怨怼。这类作品体量亦大，皆出自服劳役者之口。有因劳役无期而不能赡养父母之怨。如，《四牡》《齐诗》与今人所解同，乃服役在外者辛劳思归之诗。其“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 不遑将父 / 不遑将母”^[46]，抱怨王事无休止，为不能赡养父母而悲伤。《采薇》虽写抵御玁狁的正义战争，但“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47]，还是为担心裹尸沙场从此不能返乡而悲伤。《蓼莪》诗义尽管至今众说纷纭，简文从正面肯定该诗“有孝志”^[48]，但诗中所表达的因不能赡养父母而怨愤的情绪还是显而易见。“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 我独不卒”^[49]，名怨上天不给自己为父母养老送终的机会，实恨劳役无期。有因劳役无期而不得夫妻团圆之怨。如，《杕杜》古今或称役夫思家诗或称妇女思役夫诗，但都承认对“王事靡盬”、劳役无期的怨恨之情。“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期逝不至，而多为恤”^[50]，忧怨之情确实很浓，《齐诗》甚至称其为“愤懣之恨，发动于心，慕积之思，痛于骨髓”^[51]。简文“情喜其至

也”^[52]是孔子对该诗最后一章的解读，认为是思妇幻想丈夫马上就要回到自己身边的欣喜之情，更增劳役无期之悲。有劳役分配不均之怨。如，《北山》古今除坐实刺幽王与否的区别外，都认为是一位士子怨恨大夫分配劳役不均的诗。对此孟子早就专门揭示并阐发过：“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53]颇得正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54]，直言劳役不均而唯独自己辛劳于王事，怨恨情绪昭然；“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等后三章^[55]，则反复用对比形式揭露苦乐不均，抱怨之情蕴于字里行间。有控诉服劳役遭虐待之怨。如《小明》，笔者以为方玉润的“自伤久役说”胜于“思归说”，因各段重复的思归句中怨恨甚至恐惧受到惩罚的情绪很明显，所谓“岂不怀归？畏此罪罟 / 畏此谴怒 / 畏此反覆”^[56]等即是。《绵蛮》主旨众说不一，而“岂敢惮行，畏不能趋 / 畏不能极”^[57]，倾诉役途遥远辛苦而又不肯违逆无疑。《渐渐之石》旧说刺幽王，不可信。这是一首东征将士怀归之诗，“武人东征，不皇朝矣 / 不皇出矣 / 不皇他矣”^[58]，表达了为东征而无法顾及其它的遗憾之情，满篇都是忧伤。《何草不黄》也是一首征夫抱怨行役之苦的诗，“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 朝夕不暇”^[59]，既怨不把征夫当人看，得不到起码的人格尊重，又怨没日没夜地辛劳。

三是对谗言谗人之怨怼。作者都是朝廷中人。如，《沔水》篇《毛诗小序》称为“规宣王也”^[60]，此说清代以来被普遍否定。方玉润否定有理，后人多从之：“宣王初政，多乱定归来之诗，后皆美词，无所谓忧乱也。其朝周、召二公辅政，几复成、康之旧，何谗之有？然《诗》前云‘念乱’，后言‘谗兴’，分明乱世多谗，贤臣遭祸景象，而岂宣王世乎？此诗必有所指，特错简耳。”^[61]验之以“莫肯念乱，谁无父母”“民之讹言，宁莫之惩。我友敬矣，谗言其兴”^[62]各句，确实是一首身处乱朝而忧乱畏谗之诗。《小弁》旧说或谓幽王废太子宜臼所作，或谓尹吉甫取后妻遭逐之子伯奇所作，今依违者皆有。不管作者是谁，细品文本确实是一首儿子抱怨父亲听信谗言驱逐自己的作品。由“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疢如疾首 / 不

遑假寐 / 涕既陨之”“君子信谗，如或酬之”^[63] 各章可知，全诗充满了委屈、忧伤和抱怨。简文称该诗和《巧言》都是“言谗人之害也”^[64]，可谓一语中的。从《巧言》“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信盗，乱是用暴。盗言孔甘，乱是用餗”^[65]等句看，一是揭示谗言乃致乱根源，二是对谗者和信谗者都表达了深恶痛绝的怨恨情绪。《巷伯》是寺人（宦官）孟子所写讽刺谗人的诗，其愤恨情绪更为激烈，“彼谮人者，亦已大甚 / 谁适与谋”“苍天苍天，视彼骄人”^[66]，用质问口气和借助上天对得志谗人进行谴责；而“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67]数句，则进而对谗人提出假设性的最严厉惩罚措施，恨不得抓住扔给豺虎吃掉！足见其怨恨愤怒的程度。

四是婚姻不幸之怨怼。怨者皆为女性。如，《我行其野》是弃妇之怨，“言就尔居，尔不我畜”“不思旧姻，求尔新特”^[68]，自述被丈夫狠心抛弃而另寻新欢，斥其“亦祇以异”^[69]无端变心，字里行间充满怨恨。《谷风》篇《毛诗小序》的“刺幽王说”和方玉润的“伤友道绝说”都不可信，其当是一首弃妇诗。女主人公虽远没有《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那样刚烈自立，但被弃后同样有抱怨情绪：“将安将乐，女转弃予 / 弃予如遗”“忘我大德，思我小怨”^[70]等句，对生活刚安逸丈夫就忘大德而抛弃自己的行为抱怨不已。《白华》旧说申后被幽王废黜后所作，今人在依违之间，但诗写被弃贵妇的幽怨之情无疑。“嘯歌伤怀，念彼硕人”“念子懔懔，视我迈迈”^[71]，伤怀自己忠心于对方而被对方无端抛弃；“之子无良，二三其德”^[72]则是由伤怀变怨恨，斥责对方道德败坏。

五是流民遭遇之怨怼。如，《黄鸟》古今认识不同，《齐诗》所谓“念我父母，思复邦国”之解^[73]相对较近诗义。今人多以为是一首写流落异国之人受歧视而抒愤懑的诗。各章反复咏叹“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 不可与明 / 不可与处”^[74]，足见对所流落处的异国人的欺生行为愤恨之极。难怪简文评该诗为“多耻者其病之乎”^[75]，即多蒙受耻辱者往往会诟病、抨击社会。

六是朋友无义之怨怼。如，兄弟宴饮诗《常棣》“每有良朋，烝也无戎”^[76]，感叹朋友关键时

刻靠不住。《伐木》古今解说一致，称贵族宴请朋友故旧诗。但“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77]等句，又是明显抱怨朋友不相救的。若黄怀信所补残简“怨人”^[78]两字不错的话，则孔子的“怨人说”体认更深一层。

再看“民之有戚患也”方面。依笔者理解，“戚患”既包括民众自叙遭遇忧患，又包括写民众抒忧患情绪，还包括诗人对民众遭遇忧患的不平之情。三者有机互联密不可分，且与第一类“多言难”也有因果关系，写“难”事必抒“患”情。

民众自述忧患遭遇。如前举《黄鸟》之例，流民自述在异地倍受欺凌的遭遇，详尽备至。《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牯”^[79]等质问，蕴有奴隶的生活资料被奴隶主大量霸占的意涵，对这一不合理现象表达的不满情绪充盈于字里行间。《大东》古今认识一致，是东方诸侯国的臣民讽刺周王室只顾搜刮民膏，却不能解除东方民众苦难的诗。“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80]一章，以对比方式抒写作为东方民众遭遇的种种不公。

民众抒发忧患情绪。《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81]，戍边士兵以柳雪代春冬，抒发行役漫长，并以雪诉凄苦之痛。《苕之华》是饥民自伤不幸的诗。如果说“心之忧矣，维其伤矣”^[82]是抒发忧伤之情，“知我如此，不如无生”^[83]简直是痛不欲生了，可见忧患之深。

对民众所遭遇的忧患表达深切同情。《鸿雁》是宣王使臣救助厉王难民回归故土的诗。“爰及矜人，哀此嫠寡”“鸿雁于飞，哀鸣嗷嗷”^[84]，写尽对难民的哀痛怜悯。《正月》失意官吏为民请命，“民之无辜，并其臣仆”^[85]质问民众有何罪而被关押？“民今方殆，视天梦梦”^[86]叩问苍天为何将民众逼上绝路？愤激之情视之可感。周大夫在《十月之交》写天灾人祸为主的句子的同时，还揭示出民众苦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的诗句“下民之孽，匪降自天”^[87]。还有作品代民抒愤，如《节南山》，在揭露执政大臣尹给国家带来灾难的同时，就借机代民抒写了忧愤情绪，其“民具尔瞻，忧心

如悛”^[88]写民众怒火中烧,“民言无嘉,惨莫惩嗟”^[89]则写出民怨沸腾。

最后看“上下不和者”方面。所谓“上下”,应当包括从朝中君臣到下层官吏各个层级中的上下级关系及同僚关系。

写君臣不和者。如,《雨无正》作者侍御官直接抱怨幽王,是典型的君臣上下不和,“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90],不干坏事得罪天子,遵从天子旨意干坏事则得罪贤臣;“鼠思泣血,无言不疾”^[91],苦口婆心劝君王,可每句话都遭到君王的切齿痛恨。《菀柳》篇《毛诗小序》称是“刺幽王也。暴虐无亲而刑罚不中”^[92],今人以为是流放大臣发国君牢骚的诗。其“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彼人之心,于何其臻”^[93]各章,反复抱怨周王喜怒无常难捉摸,提醒不要混入凶险官场。

写朝中大夫与执政大臣不和者。例如,《节南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西周末年或东周初年西周旧都留守处宫廷紧张的上下级关系。不仅大夫“家父作诵,以究王讟”^[94]直斥执政大臣太师尹,“赫赫师尹,不平谓何”“不惩其心,覆怨其正”^[95]等句,还对他这个罪恶上级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写朝中同级官僚不和者。例如,《何人斯》简文云:“《何斯》消之矣,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之,宾赠是也。”^[96]大意是说《何人斯》是一首斥责诗,按一般常理,要与所爱的人分离,必然说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呢,总会以宾客之礼相赠答。言外之意是该诗没有这样做,而是讥刺对方。可见孔子认为这是一首讽刺同僚的绝交诗,其定性可取。作者多次用提问的口气问对方是什么人,其落脚点是为了揭露对方反复无常的品质,揭示绝交的原因。《角弓》是一首劝告当权者兄弟内部和睦的诗,客观上揭示了当时官场“上下之不和”的现实,说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不和是普遍现象。

写一般官场上下不和者。如,《祈父》至今认识未统一,《毛诗小序》所谓“刺宣王”肯定不对,今人或认为是卫士斥责京城警卫长官,或认为是卫士斥责田界之官。不论卫士斥责的“祈父”是谁,但正如简文所评“《祈父》之责,亦有以也”^[97],即他的斥责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位上司让这个卫士

干了他不应该干的事,搞得下级流离失所,其怨忿情绪颇浓。关键是诗人感到上级是在有意迫害自己。《正月》作者是一般官吏,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官场失意,是因为所处为官环境太恶劣,上级和周围的人都在与自己过不去。

通过如上综合讨论,不难看出,74首“小雅”作品中四类内容就占去46首,加上跨类重复出现的,共计57首,成为全部作品的主体。其中仅言“难”与“怨怼”者就有37首,虽然没有黄怀信统计的41首多,但也占了全部作品的二分之一,并且跨类重复出现的4首还未计算在内。这不仅说明四类内容确实是“小雅”作品的主体,并且说明其中抒写苦难、宣泄怨情的作品又是其主导。那么,以“多言难”和“(多言)怨怼”为主导的四类“小雅”作品内容又揭示了什么呢?正如简文所说,揭示了“衰”即社会的衰败之象。而这种衰败之象又是什么造成的?还如简文所说“少德”即当政者的少德及社会的失德,当时的一切败象都是由统治者的少德及普遍失德造成的。如此,迄今所见最早对“小雅”门类作出整体评述的简文言论,自当代表着先贤对这一门类作品内容的最深刻体认。

三 孔子对“小雅”门类内容 归纳评述的诗学贡献

由本文开篇所录简文可知,孔子论“颂”“邦风”都是各自文本内容和风格特征两项并论,甚至“颂”论的风格特征一项还具体分为乐、歌、诗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大雅”论部分因简文残缺严重而难窥原貌,但经考证补阙也是两者并论^[98]。唯独“小雅”论仅限于文本内容一项。按正常道理和孔子的一贯排比行文风格,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依笔者推测,这应该是孔子有意为之,原因当是他论“小雅”时将其对风格特征的体认蕴含融汇于文本内容的归纳之中了。而这一蕴含融汇式评述可能正是孔子以“情”解诗理念的具体贯彻。

其一,“诗其犹垆门”对“诗缘情”学说发展脉络的勾连。“诗其犹垆门”简文在所录“四诗”论全部简文中异常重要,这是孔子首次以“情”揭示诗歌的本质特征,称诗歌就像敞开的城门供人

出入,是供诗人敞开心扉宣泄情感,让读者进入作者内心世界的,也就是说诗歌的本质是用以抒情的。其既可与《论语》孔子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99]评《关雎》互相印证,也可视为以“情”评具体作品基础上对“四诗”本质特征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四诗”论简文的以“情”解诗理念在对“小雅”文本内容归纳中呈现得最为突出,以“情”解诗理念贯穿“小雅”论始终。孔子这一用“情”的结果便是,归纳概括“小雅”文本内容的同时对其风格特征的定性本就蕴含融汇其中了,这个风格特征就是“怨”。因为这一意涵在内容归纳的文句中体现得异常凸显,所以孔子在后面的行文中就没有再像论其他“三诗”那样专门表述。如果笔者的分析大体符合孔子的思维逻辑,这一发现的诗学意义就不可小视了。

人所共知,早期的西方文学特征是再现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则是表现文学,而最能代表我国表现性文学理论的就是“诗言志”“诗缘情”两大学说。两学说的创立和体系建构,不只是因为其异于西方才价值凸显,而是因为其真正揭示了诗歌这一文学形式的本质特征才屹立于世;尤其是“缘情说”,不只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民族文化心理,并且最具科学性,具有跨越民族的普适性理论价值。而这两大学说恰恰都与如上简文之论有关。

两大学说的意识,最初应该是源于《诗经》作品。诗句中比较明确表达作诗(歌诗也是自己所作)目的有17首,皆在“风”和“二雅”中,其中“小雅”最多。尽管理性的“志”和感性的“情”具体表现到诗歌作品中很难区分清楚,但本文还是作了大体区分。“言志”的诗句如“维是褊心,是以为刺”^[100]“夫也不良,歌以讯之”^[101]“家父作诵,以究王讻”“作此好歌,以极反侧”^[102]“王欲玉女,是用大谏”^[103]等,明言作诗的目的为或刺偏、或警告、或追责、或揭伪、或劝谏,都表明了通过作诗所言的“志”。“缘情”的诗句如“不我过,其啸也歌”^[104]“心之忧矣,我歌且谣”^[105]“岂不怀归,是用作歌”^[106]“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107]等,明言作诗的原因为或歌被弃之苦、或释胸中之忧、或

抒怀乡之思、或诉被谗之屈等,都倾诉了通过歌吟自作之诗所抒的“情”。但需要清楚的是,如上诗句不论所言之“志”还是所抒之“情”,皆为具体所指,没有一句概指,只有创作意识,还没有理论意识,因而也就全都不具理论属性。如此,仅能称其为“诗言志”和“诗抒情(或缘情)”学说的滥觞。而两大学说同时同步滥觞并且源于同一经典,又至迟在西周末年就已开启,同时又积累了大量作品范例,是颇为有趣和值得自美的。

可惜的是,就传世文献所见,同源滥觞的两大学说在后来的正式形成和建构发展却极不平衡。“言志说”远远超越“缘情说”的发展。《诗经》之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晋国正卿赵武正式提出“诗以言志”,使“言志”现象朝学说化发展向前推进一大步。单从记载年代看,已是晚在孔子6岁时的春秋末期了。不过,笔者赞成顾易生的推断,其实这一概括性揭示已流传了很长时间,赵武“似已作为成语来引用”^[108]。因为赵武的话是对郑国大夫伯有赋之诗所作评语,因此指的是“(赋)诗以言志”,而《左传》所记载的外交场合最早的赋诗言志活动是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孔子出生前的86年,由此推断,这个成语当时最少已流传七八十年了。这个进展的性质就是完成了由具指到概括归纳的转变,初具理论属性。所谓“(赋)诗以言志”,表达的是赋诗者而不是《诗经》作者的思想感情,当然更算不上揭示诗歌本质特征的“诗言志”学说,属于半理论属性的发展状态。

至《尚书·尧典》终得正式提出了著名的“诗言志”理论学说,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109]即是。它的理论价值主要在于超越了此前作诗、赋诗、歌诗、听诗、学诗等各个具体方面的目的性,而用高度提炼概括的一个“志”字,揭示出诗歌的本质属性,最早彰显了中国诗学理论的表现性特征。关于这一学说正式产生的时间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朱自清先生,但他摇摆于与《左传》“(赋)诗以言志说”同时或晚于两可之间^[110],而两部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统编教材则一确定为西周之前一确定为战国末期^[111],相差极大,皆不可从。笔者借助出土文献大体确定为晚于“(赋)诗以言志说”而又早于孔子的“诗

亡隐志说”^[112]，也就是说，“诗言志说”正式确立于略早于孔子的春秋时期。而这一学说存在的最纷扰的问题是，历代对“志”之内涵的理解，对其含不含“情”的问题自古及今聚讼纷纭^[113]。从《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14]，到孔颖达“情志一也”^[115]，都“志”“情”并举。其实讨论的前提就是只有“言志说”的存在而没有“抒情（缘情）说”的存在。甚至，古人讨论本身就是为了取消“抒情说”的存在，因为“志”中已含情，“抒情”“缘情”学说自然就没有单独提出的必要了。至此可见，“诗言志”学说经历了作诗言志、赋诗言志两个发展阶段之后，在早于孔子的春秋时代已正式建立，此后就是稳固和发展丰富的问题了。

而“缘情说”就不一样了。传世文献中，“缘情说”不仅直到西晋陆机《文赋》才正式确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流亮。”^[116]其时“言志说”的建立已800多年过去了。更为遗憾的是，从《诗经》“抒情”句到陆机《文赋》句，漫长的1000多年的时间跨度，历览期间众多传世文献相关记载，竟没有发现“抒情说”发展的基本轨迹。屈原《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117]，仍如前举《诗经》例句一样，意在客观说明借诗歌以抒发怨愤之情的情况，也不能算作概括揭示诗歌本质属性。从传世文献中未能见出发源于《诗经》的“抒情”意识向前推进的印迹，同时发源的两大学说的两条线，在先秦断了一条，成了一说独秀。

而上博简《孔子诗论》“四诗”论的出现，却作为关键一环，将西晋的“缘情”学说与西周末的“抒情”意识正式连接上了，恢复了被传世文献中断的两大学说发展中的另一条线，将“缘情”学说的初成期提前了700余年。其说明，同源共时的“言志”“缘情”两大诗学学说已一前一后共同确立于春秋时代，形成了双峰并峙局面。区别在于“言志”学说春秋时代已完成体系建构正式确立，之后进入稳固和不断丰富发展期，而“缘情”学说紧随其后以“抒情说”的面目和形象比喻的表现形式初步确立。同时，其自身的理论贡献在于，“诗其犹塙门”学说比“言志”学说更为科学地揭示了诗歌的本质属性致其更具普适价值，并且还将这一理念

贯穿于对“小雅”类作品的归纳评述之中，使其更具实践意义和生命力。

其二，以“怨怼”与“戚患”归纳“小雅”风格特征对后世的沾溉。孔子之前，季札对“小雅”风格特征的揭示是“思而不贰，怨而不言”^[118]，意为“小雅”文本的风格特征是忧思而没二心，怨恨而不行于语言。对读“小雅”74首作品，“忧思”和“怨恨”确实就是它的基本风格特征，无二心确为事实，但不存在不形于语言的问题，作品不仅“言”了，而且是愤怒激烈地直言了。因此，最早的王肃注所谓“非不能言，畏罪咎也”^[119]也是对“小雅”作品的误读。这说明季札对“小雅”文本风格特征的体认对了一半错了一半。至孔子，简文则匡正为“怨怼”与“戚患”。荀子应该是较早接受孔子这一观点的人，他当读到过孔子简文。其“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120]的“小雅”之评，突出了“疾”“思”“文”“哀”，正是本于孔子的哀怨风格说，并进而肯定了“小雅”文采斐然的特性。当然，“思往者”之“往者”表述也隐约有季札言论的影子，甚至启发了杜预的“思”字之解。

至为可惜的是，到了汉儒，对“小雅”之“怨”风格特征的整体认识反又倒退了。《毛诗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121]。研读可知，《毛诗序》论“小雅”的新贡献有二：一是将前人的讨论发展到为“小雅”正式下定义。即“雅”就是“正”，与“大雅”相比，“小雅”书写的题材相对较小，没有“大雅”题材重大。对读作品可知，这一点是符合实际的。仅依序各截取前几篇题目便不难看出：“大雅”如《文王》《大明》《皇矣》《文王有声》《生民》《公刘》等，“小雅”如《鹿鸣》《四牡》《常棣》《伐木》《采薇》《出车》等。前是宫廷层次，后是贵族和民间层次。因为孔子的立足点不是为“二雅”下定义，

所以没有专门比较,而是重在归纳阐发各自门类的特征。二是首次提出“变风”“变雅”概念。这一问题后人解释很多,有从教化上分,有从时间上分,聚讼纷纭,至今也没能很好解决,本文也不拟讨论。这里想说的是,《毛诗序》提出“变风”“变雅”概念的用意,倒是为了呼应季札提出的“周德之衰说”,因不知汉儒读没读到过孔子简文,其客观上呼应了孔子的“少德说”,值得肯定。

不过,从引文可见,说《毛诗序》倒退是指其没有对“小雅”的哀怨风格特征予以揭示。其实,揭示“小雅”哀怨风格特征才是最有价值的,恰恰在这一点上《毛诗序》反而体认缺失。从上引“变风变雅”后面的一段文字中,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所谓“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共指“变风”和“变雅”而言,后面两句名言“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以“变风”冠其首,但依笔者推测,这两句很可能也是统言“变风”和“变雅”,不只单指“变风”,是以偏指代全指。因前面说的就是“变风变雅”共同产生的原因,下面自当是其共同的表现特征。这样体认符合《毛诗序》作者原意。如此则不难发现,所谓“怀其旧俗”,所谓“止乎礼义,先王之泽”,正是季札评“小雅”风格特征的“不贰”“不言”“先王之遗民”。这说明《毛诗序》以论“变风变雅”的形式间接论“小雅”风格特征时,又直接本于早已被孔子纠偏匡正过了的季札的“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说。所以,《毛诗序》间接论“小雅”风格特征,是对先秦诗学理论的一个倒退。

所幸,孔子关于“小雅”风格特征的卓见并未因《毛诗序》的缺论或间接误论而受到重大冲击。如儒家思想体系之外的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中归纳出接续孔子和荀子认知的意涵:“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122]我们虽不能确认刘安是否读过孔子简文,但从其前句化用《论语》名句看,并不排除后句也化用简文孔子言论的可能性,他起码读过荀子本于孔子的评“小雅”言论。后司马迁、班固、刘勰、苏轼、杨万里、曾丰、揭傒斯、洪垣、王夫之、李塨、浦起龙、魏源、顾广誉等历代名家,分别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楚辞·离骚序》《文心雕龙·辨骚》《王定国诗集叙》《诚斋

诗话上》《六经论》《揭傒斯书》《李诗选注辨疑序》《诗广传·卷三小雅》《诗经传注·邶柏舟》《读杜心解·卷首·发凡》《诗古微·毛诗义例篇下》《顾广誉文集·诗礼相为表里说》中征引如上表述,确认“怨诽而不乱”是“小雅”的独特风格。即便对“小雅”风格提出批评的《礼纬》、韦昭、文颖、李谐等,也是以确认其“怨诽”为前提。

正如北宋著名文学家宋祁诗句“莫肯念乱《小雅》怨,自然流涕袁安愁”^[123],又如近代南社创始人之一高旭诗句“《小雅》诗人工怨悱,大千世界自庄严”^[124]。“怨”,已成为汉代以后乃至今除古经师之外的人们对“小雅”风格特征的基本共识,足见孔子简文定性的影响之深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7ZDA2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已刊两文是:《上博简〈孔子诗论〉“颂”论及其诗学史意义》,《文艺研究》2017年第8期;《上博简〈孔子诗论〉“大雅”论残简阙文臆补与相关诗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2]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马承源主编,第127—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通假字、异体字、转读字、难造字直接用整理者释文中的规范字替换;第二简开头和第五简末尾省略号中的内容与“颂”“大雅”“小雅”“邦风”评述无关,笔者略去;括号中的字为笔者专文考释或斟酌去取专家考释成果后所加;方括号中内容为笔者专文考证后增补;用阙文符号“□”补足缺字位置;“其纳物也溥(博)”从李学勤释文及断句。

[3] 原整理者指出:“衰矣少矣:可能是就《小雅》中许多反映社会衰败、为政者少德的作品而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马承源主编,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陈桐生云:“反映王朝政治衰败,叹息为政者少德。”《〈孔子诗论〉研究》,第177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4][6][13][18][20][35][48][52][64][75][96][97]《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马承源主编,第129页,第130、127页,第136页,第136页,第136页,第136页,第156页,第147页,第136页,第137页,第157页,第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个别释文据笔者专文考释或专家考释成果所改。

- [5] 俞绍宏、张青松:《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第一册),第164—16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 [7] 曹峰:《试析已公布的二支上海战国楚简》,2000年12月17日,简帛研究网。
- [8] 季旭升:《读〈上博(二)〉小议》,2003年1月12日,简帛研究网。
- [9] 廖群:《“乐亡(毋)离情”:〈孔子诗论〉“歌言情”说》,《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 [10] 冯时:《战国楚竹书〈子羔·孔子诗论〉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 [11][29][78] 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第243—245页,第244页,第177—18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 [12][16][17][19][21][22][23][25][26][27][28][30][31][32][33][34][36][37][39][40][41][42][43][44][45][46][47][49][50][53][54][55][56][57][58][59][60][62][63][65][66][67][68][69][70][71][72][74][76][77][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9][114][115][118][121]《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阮元校刻,第943—946页,第949—950页,第955—957页,第959—960页,第969—970页,第882页,第889—890页,第888—889页,第909页,第871页,第916—919页,第947—949页,第958页,第959页,第959页,第962页,第1002页,第1033页,第1034页,第1053页,第1054页,第1054页,第1055页,第867—868页,第992—993页,第867—868页,第883—884页,第987页,第890—891页,第5950页,第994页,第994页,第995—997页,第1071—1072页,第1074—1075页,第1077—1078页,第925页,第925—926页,第970—972页,第973—974页,第978—979页,第979页,第933页,第933页,第985页,第1067页,第1068页,第929—930页,第871页,第877页,第938页,第989页,第884页,第1076页,第1076页,第923—924页,第947—948页,第948页,第959页,第943页,第944页,第961页,第961页,第1056页,第1056页,第946页,第944—946页,第5360页,第757页,第804页,第977—978页,第1182页,第615页,第758页,第868页,第979页,第276页,第563页,第4579页,第4358页,第566—568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 [14][61] 方玉润:《诗经原始》,李先耕点校,第393页,第37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 [15] 高亨:《诗经今注》,第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 [24][51][73]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吴格点校,第585页,第588页,第64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 [38] 程俊英:《诗经译注》,第4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98] 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大雅”论残简阙文臆补与相关诗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 [108] 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第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 [110] 朱自清:《诗言志辨》,第1—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111] 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第32—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卷),第22—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112] 徐正英:《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 [113] 徐正英:《“诗言志”复议》,《中州学刊》1999年第6期。
- [116] 陆机:《文赋集释》,张少康集释,第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117] 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第12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 [119]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解民点校,第61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 [120]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第511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 [122] 司马迁:《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第248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 [123] 宋祁:《景文集·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丛书集成初编》,第8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 [124]《高旭集·九日南社雅集沪上,即席赋此》,郭长海、金菊贞编,第2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马勤勤